

最近,在央视4台“国家记忆”里看到介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降兵成长的节目《中国空降兵·捍卫荣光》。一位年已82岁高龄的女战士出现在屏幕上,我不欣喜,在心里呼唤道:你好,“王兰”,又见你向我们走来了!

这位女战士的真实姓名叫王清珍,家住湖北省孝感市军休所,退休前是解放军空降兵某师的卫生处副处长。

咱中国的空降兵部队,前身是英雄的陆军第15军。正是这支部队,在抗美援朝战斗中打了一场载入史册的“上甘岭战役”。战役结束,祖国的慰问团来到朝鲜慰问,其中有一支是由中央电影局的创作人员组成的。他们的任务一是慰问,二是采访英雄人物。采访组的成员中有年轻的编剧林杉和导演沙蒙,他们听英雄八连连长张计发等人讲战斗经历,泪水一次次浸湿记录本。

部队首长对采访组成员们说,你们采访英雄,一定不能忘掉采访王清珍!出生于铁路工人家庭的王清珍14岁加入解放军部队,接受林杉和沙蒙等人采访时才17岁。她是师部卫生所的卫生员。上甘岭战役中,她日日夜夜在我军坑道里护理伤员。有位重伤员尿道阻塞,痛苦难忍,王清珍把导尿管导尿和注射器抽尿等办法都用上了,无济于事,她不顾少女羞涩,毅然跪在伤员膝间,用嘴吸导尿管,终于把尿管导了出来,救了战友生命。

43天的坚守阵地啊,血与火的日日夜夜,坑道里的日子是多么漫长!为了慰问鼓励战友们,王清珍就在战斗间隙唱歌给大家听。她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她唱新学的革命歌曲,也唱家乡的民歌小调。她甜美的歌声把战友们的思绪带回祖国,带回山清水秀的家乡,大家亲切地称呼她为“战地百灵鸟”。后来,乔羽在为《上甘岭》写插曲歌词时,就是受到了这一幕的启发,产生了灵感,动情地写下了

传世的“一条大河波浪宽”。

创作组为什么能创作出这部经典电影?道理何须笔者老生常谈。如果创作组成员们未曾亲临硝烟尚未散尽的上甘岭深入采访,如果英雄们的事迹没有引起他们的心灵共鸣,如果他们也像当今的某些导演某些编剧一样闭门造车,新中国的电影史,哪会写下这辉煌一页?

《上甘岭》的卫生员王兰原型就是王清珍。扮演王兰的演员刘玉茹一生只演过《上甘岭》这一部电影。她从未在霓虹灯下出过风头,更没替自己制造过“新闻”,但是观众们永远不会忘记她,也永远喜爱她。1995年年底,她在《哈尔滨铁道报》上发表题为《我在上甘岭演王兰》,写道:“我当然不会忘记那次难得的艺术实践……更不会忘记女英雄王清珍。我在祖国北方黑龙江面向湖北,遥祝我的好姐妹王清珍健康,幸福!”

笔者退休前在湖北省民政厅工作(办民政刊物)。军休所的管理工作归属民政部门,所以我曾两次和孝感市民政局的同志一起到军休所看望王清珍和她老伴(也是战友)刘焕杰。王清珍退休后并未赋闲,而是义务为群众治病。她曾运用娴熟的中医疗灸推拿按摩医术,使一位卧床多年的60岁婆婆重新走路,又使一位因车祸受伤被判定为“植物人”的18岁的姑娘恢复生机。她常受邀到学校给中小学生们讲英雄们的故事,为孩子们唱“一条大河”。我曾和孝感市民政局年轻干部楚登峰合作写过采访王清珍的文章。我退休后定居上海,一有机会便托孝感市民政局的同志代向王清珍问好。

现在又在中央电视台的屏幕上见到精神矍铄的王清珍,怎不令人思绪纷纷?我们正生活在一个需要英雄精神,呼唤鼓舞人心的优秀文艺作品的特别时代,因此,看见“王兰”又从“上甘岭”向我们走来,情不自禁,写下这篇文章。

「好男孩」病毒

陈钰鹏

病毒(英语:virus,中文旧称“滤过性病毒”)是由核酸分子(DNA或RNA)与蛋白质构成的微小有机体;病毒比细菌还小,没有细胞结构,目前未将它们归入五界(原核生物界、原生生物界、真菌界、植物界、动物界)之中。病毒是由一个保护性外壳包裹的一段DNA或者RNA,具有感染机制,这些简单的有机体可以利用宿主的细胞系统进行核酸复制和蛋白质合成,但无法独立生长和复制。病毒可以感染几乎所有具有细胞结构的生命体。第一个已知的病毒是烟草花叶病毒,由马丁乌斯·贝杰林克于1899年发现并命名,迄今已有5000多种病毒被发现并得到鉴定。

病毒颗粒很小,以纳米为测量单位,结构简单,寄生性严格,有些病毒的核酸还能整合到宿主的基因组中,并诱发潜伏性感染。病毒完全依赖宿主细胞的能量和代谢系统,获取生命活动所需的物质和能量,离开宿主细胞,病毒只是一个大化学分子,它们便停止活动,形成蛋白质结晶,成为一个非生命体。遇到宿主细胞,它们会通过吸附、进入、复制、装配、释放子代病毒而显示典型的生命体特征。所以病毒是介于生物与非生物的一种原始的生命体。

人们都怕病毒感染,感染了使用抗生素无效;病毒对干扰素敏感,但干扰素是处方药,也不能随便使用,必须遵医嘱使用。1995年,人们发现了一种有益病毒(或称“好病毒”),人感染了这种病毒,不但不会得病,相反,如果艾滋病感染了这种病毒,能减慢病情的发展和减轻病症。1976年,在扎伊尔和苏丹首次发现了一种死亡率很高的疾病,因该病由一种埃博拉病毒引起(扎伊尔北部有一条埃博拉河,所以病毒以“埃博拉”命名),埃博拉病的症状是高烧和内出血,很难治愈。而这种好病毒能使该病患者的存活率提升一倍。

鉴于这种好病毒在医学上的罕见作用,人们又给它起了个外号叫“好男孩”,目前这种病毒的正式名字叫Pegivirus。从此,科学家们便一直在研究并猜测这种病毒在人体内的作用机制。这种病毒几乎不会突变,所以身体也不给予抵抗,因为否则此病毒会不断改变自己的遗传特征。后来,美国威斯康星州灵长目动物资源中心的专家们在猕猴的骨髓中发现了“好男孩”,正好人身上的艾滋病毒也是在患处作祟的。微生物学家们发现,只要这两种病毒“相遇”,“好男孩显然会企图”抑制艾滋病毒引起的免疫系统过分活跃,以防造成免疫抵抗功能的彻底崩溃。总之,科学家们最关心的是让Pegivirus的保护作用为医学服务:以药物的形式或有意识地去感染Pegivirus。



夜光杯

细节,取决于理念

任灼越

行进在大街上。结果短短半个小时,轮椅不是因为马路牙子的落差转不过去,就是因为地铁电梯与地面的不平而驶不进去。他还在驶过一个坡道时,因坡道太陡而无法通过。整个体验过程中,他多次无奈站起来,提着轮椅行走。

据悉,申城已荣获创建无障碍达标示范城市,但在达标示范中如何进一步关注细节,让残障人士、老年人出门更方便呢?这值得思考,更值得我们去改进、去完善。那天在淮海路看到一盲人提着盲杖,沿着马路边,一边敲打着人行道一边走。我忙上前扶他,对他说你走在马路上了,我扶你上人行

道吧,上面还有盲道。他说谢谢您,我知道自己在沿着马路行走,但这样最安全,人行道上障碍物很多,不小心就会撞上。我看着他远去的身影,心中不是个滋味。

前几年,我去台湾考察社会福利,在与一位公益事业社团领袖的交谈中,豁然开朗。她说,我们从事残障人事业,不是去“帮助”他们,而应是为他们提供服务。他们需要行走,我们就给他们轮椅,他们需要出行,我们就给他们坡道。我们是他们生活服务的提供者,因为他们与我们是平等的。

是的,或许是时候转变一下观念了。特殊群体的“特殊”只是需求的特殊,本无高下之分。明白这一点,问题就简单了,也明确了:提供更好的服务。而这,只与“专业”有关。



边看边聊



最近,我们金陵中学的几十位老同学聚会,庆贺高中毕业50周年,遗憾的是老校园早在几十年前就被拆除了。要知道,老校的东大楼一百多年前曾经是法国驻沪领事馆。我们经常在又长又宽的拱圈柱廊上交流学习心得,观赏浦江美景;在装潢精美的大礼堂里听报告,唱歌;在六棵硕大的法国梧桐树下上体育课……校园是一个重要的人生驿站,失去了她,我们也失去了一大精神寄托。

去年10月22日是延安中学的70周年生日,上午几千名师生在寄宿制校区参加活动,下午很多中老年学子则一起回到了老延安(今延安初级中学)。学生邀请我们老师一起在当年上过课的教室里欢聚畅聊,在“白宫”(优秀历史保护建筑)前拍照留念。不少学生还去篮球场PK球艺,在葡萄架下寻找旧迹……真可谓重走少年路,再续校园情。

有一次94届毕业生在母校聚会时,某男同学一见老班主任汪洪漪竟激动得难以自控,哽咽不已。原来他当年是一名运动员,成绩差又调皮,是汪老师的热情鼓励和近一年的无偿补课帮助他考上了大学,如今他也成了行业精英……老师们在校园里长年累月地教书育人,经常会在若干年后得到意外的回报。年初,我在微信里看到年逾八旬的沙勤老师写给学生的感谢信,他是用颤抖的右手书写的,长达四页。他曾经跌伤瘫痪,一位做中医的老学生隔天上门去为他推拿和针灸一两个小时,经过几个月的义务诊疗,沙老师已经能自己下楼去散步了……几年前,我在“翡翠号”浦江游轮上参加大同中学的师生聚会。学生们请来了三位嘉宾——已故班主任朱伯华的夫人和两个女儿。朱夫人告诉我,朱老师去世二十年来,每逢节假日都有学生来探望她们;前不久她乔迁新居,学生们还出了大力。

学生一旦走进校园,素不相识的人就结下了同学缘。三五年里,大家一起在求知求真的大海里携手畅游,击水戏水,最终到达成功的彼岸。这种情同手足的情谊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我有位80后的学生得知二十几年前的小学同学手术缺少血源,就瞒着家人无偿献血300cc。也有很多人同为同学做“红娘”或伴郎伴娘,做“猎头”介绍工作……哪怕在异国他乡,一声同学,一声校友,心的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最近我有位大学同学过世,噩耗传到同学群里,大家或三言两语或短文或照片,纷纷表示哀悼与缅怀,一直到半夜。这样的悼念持续了三天。毕竟四年同窗,四十年交往,“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也”!

校园情、师生情和同学情是人生长河中的三股暖流,它们在母校积聚,交汇,结集;由母校奔涌而出,流向天涯海角,滋润生命年轮。尽管岁月总被雨打风吹去,但是母校情结却永驻心底。

母校情结

俞昌基

风筝

千里生

前不久,去某大型超市购物,见一坐着轮椅的残障老人购完物,无专用通道付费,后收银领班出来,取了他购的物品,在普通收银通道代他付了费,才解了他无处付费之难。

笔者作为一个社会福利工作者,曾有幸参与无障碍城市达标示范的创建工作,眼见一条条盲道通向四面八方,一个个台阶旁砌起了坡道,一件件无障碍设施安装在大街小巷,不禁为城市文明程度的提高而高兴。但如何在细节上更加精细,比如盲道的铺设是否合理,坡道的斜度是否科学,盲道的维护如何到位等等,以让残障人士、老年人外出更舒畅,仍然是值得探讨的。

日前,在网上看到一个体验残障人士出行的视频,给了我不少感慨。一位小伙子坐着手动轮椅,独自

欲放风筝,必得先有风等。有人家境富裕,随便买一个就是;有人家境贫穷,就得自己买纸、买黏合剂,找寻合适的细棍子,然后自己制作;若欲做得漂亮,还要买颜料,涂画出心中的美。天上有漂亮华丽的风筝,也有丑陋简易的风筝,但无论什么样的风筝,它们都一样在天空中自在飞翔。

孩子们最喜欢看风筝在天空中盘旋飞翔的样子,他们渴望成为风筝,或渴望着自己也能放一回风筝。

风筝是自由,风筝是梦想。每个人都有成为自由飞翔的风筝的权利,每个人亦都有放飞自由和梦想的权利。

所有的风筝都应该在天空中自由飞翔,但不是所有的风筝都能在天空中飞翔。

风筝的飞翔,一半在人,一半在风。所有的飞翔都需要积累,经验的积累,内心渴望的积累;所有的飞翔都需要守候,合适的风的守候,合适时机的守候。谋事在人,成事在风。

人啊,何尝不似那风筝?人生啊,又何尝不似放风筝呢?



神奇的中医

剪影 李建国

南瓜笋,其实并不是笋,而是南瓜干,它是淮北的一种特产。在淮北大农村,粮食作物一般都只种一季,青黄不接的时间较长,所以南瓜在淮北人的食谱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它既可当粮又可做菜,家家户户都将它视作度日之宝,尤其是在那个饥荒年代,它更是百姓心中的“天”。

南瓜收获在夏秋时节,为了便于保存,大家除了留一部分现吃的以外,其余的就切成薄片后用草木灰包裹起来用以吸收南瓜中的水分,然后摊放在簸箕里或芦席上晾晒,不消四五个日头就可制成黄灿灿的南瓜干了。

我第一次知道南瓜干还被称作南瓜笋是在上山下乡的第二年的腊月。那天村里有个小伙娶媳妇邀我去喝喜酒,酒席上,我见有一大盘红烧肉是和着笋一起烧煮的,顿时馋涎欲滴。要知道这笋烧肉可是上海人的最爱,加上这一整年里还未曾闻过肉味,能不馋吗!所以席一开我就迫不及待地挟起一大块笋和肉往嘴里送。可就是这一送却把我给惊住了,这肉不仅酥酥的还带着田野里特有的那种芳香,那笋是绵绵的却有一股嚼劲,吃在嘴里那丝

丝的甜味中还夹带着灶门口的柴草香,温馨无比。我好奇地问邻座的一位大叔:“在俺这穷旮里哪来这美食?”大叔兴奋答道:“上海人不懂了吧,这叫南瓜笋烧肉。”“南瓜笋?我怎么没听说过?”“这南瓜笋其实就是南瓜干,因为南瓜顺势切成片后其形就像一轮弯弯的月亮,晒干后一收缩就成了笋干状。和肉一起烧煮的时候,它吸收了肉中的油,又吸收了它的香甜和植物特有的芬

美哉南瓜笋

周钰栋

芳,所以味道独到。还有,南瓜笋要在肉烧至八分熟时才下锅,所以吃起来就有一股子嚼劲,极像笋干。”原来如此,想想我们这些知青,以往对南瓜干的吃法除了煮粥还是煮粥,别无他法,今日见敦,大有相知恨晚之感,于是在那次赴宴回来后便时时想着这道美食。但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里,要想吃到笋烧肉非得等到生产队里杀年猪不可,而杀年猪又都是在腊月里,所以一到腊月,知青们便天天盼着生产队里杀猪,欲分得猪肉后可以煮上

一锅南瓜笋烧肉来犒赏一下自己。当呼呼的北风敲打着窗户,纷纷扬扬的雪撒满田野,裹住树梢、盖住屋面的时候,品尝着南瓜笋烧肉是最有味道的。这种味道融化在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热爱中,波及户户乡间,飘落在幸福的歌声里。当这碗盛满幸福的南瓜笋烧肉端上桌子时,它所散发出的香味和着灶台上飘出的饭菜香,从灶门口散来的柴草香,那韵味更是十足,催得人人味蕾绽放。

可以说,这南瓜笋烧肉实实在在是我知青生活中的一道美食。后来,我上调返城,随着生活习惯的改变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这道美食也就退出了我的食谱。日前,友人从安徽旅游回来,将南瓜笋作为伴手礼送与我,让我喜出望外。望着黄灿灿的南瓜笋,那股味道便在我舌尖上翻滚起来,于是,我就按老法将这南瓜笋烧肉烹制出来后供全家人品尝。可能是科技进步了,这南瓜笋的加工工艺得到了改进,让南瓜笋远离了柴草味,但它来自大自然的韵味没变,那满身裹着的田野芬芳依然浓烈,让一家人吃得赞不绝口直呼:美哉,南瓜笋。

美食